

四川大学

考古专业三十五年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
考古教研室编

042

PDG

前 言

当我们大家齐集一堂，庆祝历史系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们无比怀念考古专业的创建者、已故的冯汉骥教授，怀念对考古专业的建设始终给予巨大关心和支持的已故徐中舒教授。考古专业在自己走过的道路上，虽然备尝艰辛，但它没有辜负先生们生前的教诲，始终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并不断发展壮大。今天有这么多校友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就充分说明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在培养考古学、博物馆学和其它各种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回顾起来，早在50年代初期，历史系就已开始为历史系专业的学生开设《考古学通论》的课程，它不但是开设的一门新课，而是吹响了川大考古专业创立的序曲，紧接着历史系建立了考古教研组，为专业创立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1958、1959年，考古教研组教师连续两年率领历史专业55、56级的同学参加了三峡地区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巫山大溪遗址、忠县涂井沟遗址的发掘工作，揭开了本专业田野考古发掘和教学实习的序幕。1960年，在校、系领导的支持下，开始在历史专业56级中进行创建第一届考古专门化的尝试。虽然由于条件不足，这届专门化还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它使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为继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之后，全国第三所设置培养考古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1960至1961年，当又一批青年同志从不同的学校来到川大考古教研组工作之后，方才为建立正规化的考古专门化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师资队伍的基础。于是，从1962年起，第二个考古专门化班在59级中建成，1972年正式更名为考古专业，1981年11月，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在川大考古专业设立博士点（含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两个方向），我们又成为具有博士授予权的少数几个专业之一。1987年，又设立了新的姊妹专业——博物馆学专业。1994年两校合并后，两个专业均隶属于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由考古教研室全面负责其教学工作。如今，考古专业已经是拥有考古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培养以博士、硕士、学士以及专科生等多层次人才的专业；已毕业的近三百名学生，正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专业成立三十五年来，根据学校倡导的“博学、奋进、求实、创新”的学风，我们始终把考古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放在首要地位，使学生通过对中国考古

学及相关课程的学习，不仅掌握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要了解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同时，还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研究方法、技术和基本知识的课程，以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广泛的知识面。此外，我们还在考古专业中开设博物馆学课程；在博物馆学专业中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这有利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知识上互相吸收，扩展其知识的视野，也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三十多年的探索和总结，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

考古学的重要特点是它的实践性。通过田野工作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熟练的田野工作的基本技能，是我们重要的教学内容。事实说明，不掌握田野考古技能，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学生，也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我们还特别重视提高其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没有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考古工作者。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不但十分重视组织好考古专业学生的田野实习，还首先把考古实习列为博物馆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已经收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多年来，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实习基地，绝大部分实习是与其它科研单位合作进行的，但并未因此而降低对学生的要求。我们参加发掘过的遗址已不下数十处。比如在省内巫山大溪、忠县涂井沟、广汉三星堆、汉源狮子山、西昌黄联关、成都市区等遗址，在湖北有宜都红花套、江陵纪南城、宜昌清水滩、白庙、中堡岛、枣阳雕龙碑等遗址，陕西汉中的龙岗寺遗址，河南洛阳的东周王城，西藏昌都的卡若以及云南、广西等省区的各类遗址和墓群。还在成都市周围和省内其它地区开展过多次考古调查，尤其是参加西藏的文物普查工作，更长达三年之久。这一系列考古实践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田野考古工作技能，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有的已为中外学者所瞩目。

早在六十年代，冯汉骥先生曾恳切的告诫青年教师：要想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他的谆谆教诲，深深地教育了大家，并已传递给了青年同志，形成了教研室良好的研究风气。

在研究方向上，根据成都地处祖国西南，而西南地区仅有我校开办了考古专业的特点，我们始终坚持立足西南，面向全国，把西南地区的考古作为研究重点。早在三、四十年代，冯汉骥先生就对西南民族地区考古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五、六十年代更是对上迄史前，下至唐宋的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特别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巴蜀文化、滇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奠定了我专业研究西南考古的坚实基础。1972年，为复办因“文革”中断的我校考古专业，我们曾赴北京等地向同行专家学者征求办学意见，王冶秋、尹达、夏鼐、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亦建议我们坚持以西南地区考古研究为重点，形成特色。专业创立三十五年来，经过不懈努力，现在形成了以长江中上游考古、道教考古和西藏地区考古为重点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注意对全国其它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三十多年来，教研室人员虽然一直不多，但已发表各种论文、报告数百篇，

出版各种著作三十多种，其中绝大部分又是近十年来出版的。其中既有从事考古学基础研究的专刊报告，也有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撰写的学术论著。这些成果中，有的是根据教学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有的则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通过教学活动进一步提炼形成的。科研与教学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有5项是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6项为校级重点科研项目，还有3项获得了国外研究基金的资助。已发表的科研成果中，一项获全国图书二等奖，6项获省级各种奖，4项获校级科研成果奖。

全国的改革开放，也为专业打开了对外联系的大门。我们已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和台港地区的科研机构或高等学校建立了联系，他们已有多批学者前来访问交流，或参加学术研讨。考古教研室也先后有十多人到上述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或参加会议。我们还与日本早稻田大学，茨城大学在我校成功地举行了学术研讨活动；还接收了日本、波兰留学生到考古教研室学习。此外，我们也积极参加国内各类学术会议，邀请各方面专家为师生作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这些活动，对于我们学术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专业的兴衰，还与师资队伍的建设密切相关。我们在师资建设方面，虽然遇到过各种困难，但经过努力，目前已建立起一支人员较为稳定、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精干的教师队伍。全教研室目前有教授3人（含博士生导师一人）、副教授4人、讲师5人、工程师1人。全教研室不论是老教师、还是青年人，大家都能彼此尊重，老带青，青促老，互相勉励，团结奋进，形成了良好的共事环境。考古教研室人数虽少，但大家都能勇于承担任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作用，担负着两个专业近三十门课的教学和繁重的田野实习指导任务，以及教研室的各种琐碎事务。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在教学和工作的突出成绩，有5人获省级二等奖、5人获校级奖、教研室先后两次获校先进集体。

在考古专业创建和发展的三十五年中，我们曾得到省市文物主管部门和各科研单位的大力帮助和热情的关心，也受到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以及其它省市兄弟单位的积极支持和帮助。离开这些，也就没有考古专业的今天。对于大家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要始终铭记在心。我们还要感谢校、系领导和学校各部门对我们的关心、指导和帮助。

放眼未来，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还应该着眼于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谦虚谨慎，克服困难，勇于进取，把考古、博物馆两个专业建设得更好。

目 录

前言

徐中舒先生传略·····	1
冯汉骥先生传略·····	4
大事记·····	7
教职员名录 ·····	38
一、现有人员名录	
二、调离人员名录	
三、离退休人员名录	
校友名录 ·····	45
一、本科毕业生名录	
二、研究生毕业生名录	
编后记 ·····	60

徐中舒先生传略

张勋燎敬撰

徐中舒，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898年10月15日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就食慈善机构清节堂，七岁入该堂附设之育正小学堂启蒙。其后，曾入尚志中学、皖省中学、安庆市第一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读书，偏爱国学。在安庆师范期间，深受擅长桐城派古文及先秦诸子之语文教师胡远浚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16年于安庆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该校附设小学及庐江小学任教。以后又在桐城方守敦和富于藏书的上海李国松处作家庭教师，讲授《左传》，广泛研读各种古代文献，开始接触金文甲骨和孙诒让、罗振玉等人的著作，培养了研究学问的浓厚兴趣。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招收第一届学生，先生毅然放弃家庭教师的优厚待遇，考入研究院师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李济等人，学习甲骨金文、古史、考古学、人类学、考据学等多方面的新知识和新的研究方法，于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法获益尤多。在清华研究院以最短的一年时间完成学业后，自1926年始，相继在合肥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任教，受聘为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29年因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初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所期间，最初主要从事清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两年后研究中心转入先秦史、古文字学和考古学方面，发表了以《耒耜考》为代表的一系列极富创见的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先生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合聘，任四川大学教授至逝世。在川大工作期间，解放前除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而外，还作过战时迁校入川的中央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的兼职教授。新中国建立以后，1956年被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过西南博物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以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首批评定的博士生导师，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建立了包括先秦史、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三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同时，还兼任过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

省文管会副主任、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等职。建国以后，还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于1991年1月9日逝世，享年93岁。

徐中舒具备多方面的学术专长，融汇贯通，互相渗透，承王国维古史二重证之研究方法加以发展，自成体系，独具特色，造诣极深。其研究方面甚广，先秦史、明清史、古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皆各有建树，著作甚丰，于先秦史与古文字学之贡献尤为卓越，在考古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兹仅就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两个方面略述其要。

徐中舒虽未从事田野发掘，却深知地下埋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是研究古史和古文字必不可少的依据，不仅在研究中广泛利用了考古学上的各种发现和研究成果，还对考古材料本身作了不少独立的研究，根据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独特见解，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除了散见于他的一些古文字和古史著作中之外，有关专门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以后，从遗址到器物，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徐中舒治考古，反对将遗物遗迹孤立起来研究，力主应以复原古代历史为最终目的，除了考古材料自身外部形态及彼此相互关系之分析考察外，还要广泛联系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和古代文献记载，对考古材料的年代、性质、作用、意义作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30年代初新石器时代考古在我国刚刚开始不久，在材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他发表《再论小屯与仰韶》(1930)，对仰韶文化和殷墟发掘材料进行研究，首先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创说。这个推断虽然后来被新发现的材料所修正，他自己也改变了观点，但这个意见在30和40年代却曾被我国史学界广泛采用，一时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看法，对夏文化探索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950)结合大量文献记载和古文字字形材料，研究了殷墟出土各种类型的房屋建筑遗迹的形制结构，科学地认识了我国古代人类居住建筑逐渐由地下上升至地面的发展历史，是非常出色的建筑考古方面的著作。专书《殷氏编钟图释》(1932)和大型论文《古代狩猎图象考》(1932)是他研究先秦铜器的代表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前者专论春秋时期的一组编钟，后者研究国内外收藏的8件春秋战国年间的狩猎纹铜壶，和同类、同时代的其他器物相比较，和古文献记载相对照，全面研究了器物的名称、组合、形制、纹饰、铭文、工艺、用途、用法、年代、国别和所反映的种种历史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铜器断代的八条标准，对数十种铜器纹饰特征、含义、来源和发展序列等作了精密的研究，为铜器的系统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被认为是我国考古史上有关方面的开创性之作。《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1932)研究一无纪年残破砖室墓出土之五种遗物，详考器名，分析汉晋墓砖铭文发展序列及龙形图象之不同时代特征“以为严密断代之标准”，判定墓葬及器物为西晋遗存，其准确性已为解放后大量科学发掘材料所证实，足见他考古之精。他还对四川彭县蒙阳镇出土的殷代铜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铎于以及河姆渡文化的历史问题

等问题，作过专题论述。

徐中舒古文字学之研究成果，除大量散见于考古及古史论著中者而外，专门著作包括《虢敦考释》(1932)、《陈侯四器考释》(1933)、《金文驳正释例》(1935)、《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1959)、《西周墙盘铭文笺释》(1978)、《中山三器释文及宫室图说明》(1979)、《西周利簋铭文笺释》(1980)、《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1980)、《周原甲骨初论》(1982)、《怎样考释古文字》(1983)、《怎样研究古文字》(1984)、《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1985)等论文，和由他主持编著出版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980)、《殷周金文集录》(1984)、《汉语大字典》(1986)、《甲骨文字典》(1988)等大型国家重点项目专著，不下数十种。隶定文字，考释文意，考察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和规律，创造新的研究方法，皆有巨大的贡献。如《陈侯四器考释》之新释文字纠正了不少旧释的错误；《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之论复、穴、阜等字之由来，“京、丘皆古代人为的穴居”，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有很大的影响。《金文驳正释例》系统研究周代铜器铭文中数十种祝嘏词汇的含义、用法、时代特征和发展序列，已成为治金文者之必读文献。《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全面深入地论证了殷商以前从大汶口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只能是一种文字发展尚处于象形前期阶段的单纯表意图象符号，而不是真正的表音文字，不同于学术界一般的看法，很有说服力。几种有关古文字研究方法的论著指出：研究古文字需从《说文解字》入手，但对许慎的六书条例不可盲从旧说，作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科学认识。认为古文字的研究，“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而不是凭空悬想，望文生义”。为古文字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将古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徐中舒治学谨严，为文从不蹈袭前人，必有创见而后发，自成体系，独具特色，贡献至巨，是享誉中外的一代大师。为人正直忠厚，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诲人不倦，奖掖后进，不遗余力。道德文章，深受生徒之爱戴，学人之景仰。他90寿辰，周谷诚手书祝词称：“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作创造，精密无伦。讲学授徒，七十年整。影响所及，遐迩咸钦。”可谓的评。让我们继承发扬他的学术传统和人格精神，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吧！

冯汉骥先生传略

林 向敬撰

冯汉骥先生(1899—1977)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是运用现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奠基人,是学生永远爱戴的导师。先生字伯良,汉族,1899年11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小溪塔冯家湾一个中学教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1904年先生即进私塾发蒙,开始培养起对中国古代典籍的兴趣。1909年起,先生一直在外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接受近代欧美的文化知识教育,但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始终拒绝信教。1914年在宜昌华美书院,因鼓动同学反抗美籍校长侮辱中国教师,被罚停学半年。1916年春,进安庆圣保罗高级中学读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于1919年毕业,免费保送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因先生拒绝信教和读神学,被取消免费资格,先生不折不挠,敢作敢为,勤奋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科。毕业工作后,两年内节俭衣食,清偿所欠学校的全部学费。

先生于1923年毕业后被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先任襄理,因工作努力,次年升任图书馆主任。其间正在厦大执教的鲁迅先生与冯先生过从甚密,先生为便利鲁迅先生潜心考订中国典籍,特在馆内为其安置一寝室,两先生朝夕切磋,致冯先生亦受益匪浅。先生志趣注重实际,闲暇则协助生物学秉志教授到野外采集标本,协助研究。此段经历对先生一生治学影响深远,而后先生选择人类学作为深造方向,实肇端于此。

1931年夏,先生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深造,靠在汉和图书馆打工以自养。1933年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完成博士论文。此间,先生对社会进化论学者摩尔根(L. H. Morgan)的名著,下了很深功夫研读,并亲身到印第安人村落调查,对原始民族社会有很深的理解。对先生学术影响较大的教授还有:持文化进化论观点的狄克逊(R. B. Dixon)、文化心理学派的哈罗威尔(A. I. Hallowell)。并师从斯派塞(H. Speier)和布朗(N. Brown)学习亚州考古。先生在留美期间接受了人类学学科的严格训练,具备坚实

的体质人类学和广博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先生熟练的人体骨骼测量技能，一直令人赞叹。

先生以现代人类学知识（包括考古学与民族学）来剖析中国古代典籍，对古代社会制度的研究论著，如《玉皇的起源》、《彝族的历史起源》、《以蛊著称之中国巫术》等等均以其言论的新颖，资料的翔实，推论的精当，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其中尤以《中国亲属制》的学术影响力为大，先生运用“叙述式”与“类分式”亲属制原理分析中国典籍所载古代亲属名称的由来，指出中国婚姻制度中最能与亲属名称发生关系的，莫过于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并论述了，三种婚制在历史上的变化，阐明了真象，合理地解释了我国经学大师们两千年来聚讼不休的问题，先生以此卓越学术成果在1936年夏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即所谓双学位）。回国后的中文节本《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发表在1941年《齐鲁学报》第一期上，在国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1937年，先生接到正在筹建中央博物院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济先生的邀请，不顾日军侵华战云正浓，携家归国。因“八一三”上海战事激烈，被迫中途在香港上岸，经广州到武汉。抗战事紧，忙于内迁，先生遂到成都，受四川大学聘任史学系教授，1941年任四川博物馆馆长，1944年代理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主任。从此致力于考古学与社会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38年任四川大学西南社会科学处人文组研究指导人时，亲赴岷江上游羌区考察，历时三月，备受艰险，获取大量民族学资料，并在汶川萝卜寨清理一座石棺葬（SLM1），其后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西南民族考古的里程碑式成果。同年，先生又在成都平原上对“大石遗迹”作考古调查，其后发表的《成都平原上的大石遗迹》所作分类与论述，为后来的发现所证实。在先生的主持下，1938年四川大学曾函请前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联合调查四川文物。后来川大师生受委托对四川境内的古遗址、墓葬、古建壁画、石刻造像等作了国内一省区首次文物普查，收集标本数千件，后来全部移交四川博物馆筹备处。1939年，先生任当时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进川康藏区调查，对民族识别多有创获，积稿十余竹筐，所发表的《西康之古代民族》仅其全豹之一斑。1942—1943年先生与吴金鼎、王振铎先生等一道发掘五代前蜀王建永陵，先生始终主持其事，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发掘技术、抵制社会恶势力的干扰的顽强意志，取得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在此后二十年中，不论世道变幻，坚持研究，陆续发表成果，终于在1964年完成出版《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先生在学术上“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令人折服。1944年先生在川大校园内清理一座小型唐墓，由于观察周到，处理得当，从朽锡中取出成都县“龙池坊”唐代纸本雕版印刷品，此乃国内迄今保存最早的印刷品标本，先生的“一丝不苟，细微谨严”的工作作风，堪称楷模。

建国后，先生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历任川西博物馆长、西

南博物院付院长兼自然博物馆长，并与徐中舒、蒙文通、闻宥、杨啸谷、张秀熟等学者一起指导四川省的考古文物事业。1954年先生继任四川省博物馆长兼四川大学教授，为外校及兄弟院校讲授考古学通论，并多次亲率师生赴省内外考察、讲学。1958年川大历史系成立考古教研组，先生为主任，率55级师生与省市博物馆组成长江三峡库区四川考古队，发现新石器到战国时代遗址36处，战国至三国时代的墓葬30处及唐宋石刻及古代炼铜遗址等，取得了丰硕成果。1959年先生又率56级师生与省市博物馆联合发掘巫山大溪遗址与忠县涂井沟遗址，在以后的整理中指导研究生命名的“大溪文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长江上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1959年起先生为川大培养考古学研究生2名，毕业1名。1960年起在历史系设考古专门化，在高年级开设田野考古课程，毕业2班28人。先生除亲自授课外，还指导青年教师练好教学、科研的基本功。先生的言教身教，谆谆善诱，在学术上的卓见灼识至今长令吾等追忆。先生一贯强调“教师的教学要提高，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讲课是艺术，要善于启发、引导”。先生的治学思想注重实践，谆谆教导“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主张博览群书，要有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基础，“要博才能精，先要作通材”，对与考古学相关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等等都要旁征博引，为我所用。六十年代，先生发表的《四川古代的船棺葬》、《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关于“楚公参”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兵器》等等论著无不以其观察的细微、思考的周详、论证的广博、令人服膺，成为里程碑式学术著作。先生注重田野实践，讲究身教，1963年亲率师生调查邛崃汉代冶铁遗址时，从河中捞出唐代龙兴寺石刻，1963年亲率59级师生与省市博物馆合作发掘广汉月亮湾遗址，当时先生说：“很可能此处原是古蜀国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八十年代大规模的发掘证实了先生的预言，广汉三星堆遗址群确是商代古蜀的都城。先生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执教近四十年，桃李满天下，无论是京畿边陲，黄河长江都有先生的门下，很多人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骨干力量。先生之道，流风余韵，绵绵不绝。

1975年11月，先生因十年动乱的摧残，身体衰弱，仍坚持为从湖南、贵州来求教的考古工作者作有关夜郎问题的研究报告，会后即病倒入医院治疗。病榻上仍念念不忘要完成多年的学术夙愿，以迎接“科学春天”的来临。首先是探索长江流域古文化的源流，先生认为我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要到长江流域去找，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不会局限于黄河流域；其次先生还要完成一些经手的田野发掘报告，如《羊子山发掘报告》；再次，要利用四十年代的调查材料系统地研究西南民族历史。先生为这些课题已筹划了数十年，认为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但终因年高体衰，医治无效，于1977年3月7日与世长辞。留下未酬壮志，以待后生。现有《冯汉骥考古论文集》（1985年）行世。

大事记

编写体例和说明

一、本《大事记》记录的时间范围上迄我校考古学教学、科研的孕育时期，下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月。

二、本《大事记》主要收录本教研室有关考古学、博物馆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和人员变动以及相关单位的学者前来讲课或学术讲演、访问等。涉及本教研室教取人员、研究生承担工作任务者，均录其姓名，其余研究生、本科生等学生则只录人数。教职员调离本教研室后从事的有关活动不再收录。

三、本《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职教师的回忆以及《四川大学校史稿》、徐老和冯老的传记、教师论著中的相关记载，故详略不尽一致，甚至有所遗漏。

四、本《大事记》按时间顺序排列，凡月份不明者一般放在当年本年部分，日期不明者放在当月有日期者之后。延续时间较长者一般在行文中予以说明。

1935 年

夏 四川大学设置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专门研究西南地区的人文和经济。

1937 年

徐中舒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合聘，任四川大学教授。

11 月 冯汉骥受聘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考古学。

1938 年

鉴于四川文物丰富，但破坏严重的情况，四川大学函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请求与该会联合调查四川文物。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托川大进行调查并负收集、保护文物的责任。

四川大学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分设社会经济组和人文组，人文组研究边区民族、搜罗蜀中文献、考察蜀中金石古物等。冯汉骥任人文组研究指导员。

暑假 冯汉骥只身前往松潘、理县、茂汶等地，进行田野考古和民族调查，历时 3 个月。此行除获取大量民族学资料外，还在汶川清理了一座石棺墓。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此类墓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是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11 月 25 日，学校第 11 次行政会议通过，决定由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拟定四川区域内的古物调查研究计划简明书，并函复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请拨款资助。

本年 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组织人力对四川境内的石器时代遗址、汉晋墓葬、古建、壁画、石刻、造像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与收藏保护工作。收集的数千件文物，于 1941 年全部移交给四川省博物馆筹备处。

冯汉骥开始对成都平原上的“大石遗迹”进行考古调查，其后发表了题为《成都平原上的大石遗迹》的考古调查研究论文。

1939 年

冯汉骥担任当时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在川康藏区作社会调查，对民族识别有许多重要发现，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惜未能完成报告，仅撰《西康之古代民族》一文，摘要介绍了若干观点。

1941 年

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冯汉骥被推荐担任筹备主任。

1942 年

冯汉骥主持发掘成都西郊前蜀王建墓（永陵）。参加发掘的还有吴金鼎、

王振铎先生等。

邓少琴受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了川康历史、地理、金石、西南民族历史等课，注重利用博物馆馆藏文物和本人实地调查所得金石拓片，结合文献，启发、引导学生对文物考古的兴趣。同时还负责原尊经书院所藏木刻版和地方志的整理工作。

1943 年

冯汉骥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1944 年代理该系系主任。

1944 年

4 月 冯汉骥发掘清理四川大学校园内筑路时发现的唐宋墓葬。由于发掘清理工作采用科学而严密的方法，观察周到，对遗物处理得当，从唐墓随葬的已朽坏的银钏中取出中晚唐时期纸本雕版印刷品一件，此乃国内目前保存年代最早的中国印刷品标本。协助发掘的还有杨有润先生。发掘资料经冯汉骥整理研究，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为题，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5 期。

1947 年

秋 徐中舒担任改组后的四川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冯汉骥、闻宥、邓少琴均续任历史系教授。

1949 年

7 月 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一书作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史学丛书第一辑出版。该书集邓少琴多年实地调查、收集所得汉代碑刻墓铭文字，徐中舒为该书作序。

1950 年

西南博物院在重庆成立，徐中舒任院长，冯汉骥任副院长，邓少琴任业务秘书。

1953 年

徐中舒由重庆西南博物院返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4 年

春 成恩元为历史系历史专业 52 级学生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

秋 成恩元为历史专业 53 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其间带领同学参观成都羊子山遗址和汉画像砖墓。

1955 年

冯汉骥由重庆西南博物院调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同时还为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讲授《考古学通论》课程。

暑假 历史系历史专业 52 级学生由成恩元带队赴彭山县双江镇，对当地崖墓进行考古调查和实测。

秋 张鸣寰自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分配至我系工作，担任冯汉骥助教。

1957 年

春 冯汉骥为历史专业 54 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并率学生赴西安参观访问，同时应邀为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作学术讲演。历史专业教师谢忠梁协助参观访问的日常工作。

9 月 本校历史专业 53 级本科毕业生张勋燎留系担任冯汉骥助教。

张鸣寰调离我校到复旦大学任教。

1958 年

历史系成立考古教研组，冯汉骥任主任，张勋燎任秘书。

冯汉骥为历史专业 55 级本科生讲授《考古学通论》。

10 月 历史专业 55 级本科生由冯汉骥、张勋燎率领，与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联合组成长江三峡水库区四川考古普查队，对库区巫山以上的长

江及其支流沿岸进行了系统的较大规模的文物、考古调查，为三峡库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批重要资料 and 基础。

冬 冯汉骥应云南省文化局之邀，短期参加云南晋宁石寨山的发掘。

1959 年

春 冯汉骥为历史专业 56 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并率学生参观考察广汉中兴乡古遗址。张勋燎参加了实习和教学的辅导工作。

6~7 月 冯汉骥应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及云南省博物馆之邀，赴昆明云南省博物馆，对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葬出土遗物进行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等三篇论文先后刊于《考古》1961 年 9 期、1963 年 6 期、《文物》1974 年 1 期。

7~8 月 历史专业 56 级学生由冯汉骥、张勋燎带队，与四川省博物馆合作，联合发掘了忠县普井沟遗址和巫山大溪遗址，首次发现了大溪文化墓地。

秋 林向从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由冯汉骥指导，这是川大考古教研室（专业）培养的第一名研究生。

1960 年

春 张勋燎为历史专业 57 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其间曾率学生赴广汉三星堆遗址作短期考古调查。

9 月 根据教学改革计划，大学本科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我系决定在 56 级（五年级本科生）分设考古专门化等三个专业方向，共有 13 名 56 级学生分配到考古专门化学习。此为我校设立的第一届考古专业化，我校遂成为继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之后，全国第三所设置培养考古学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

10 月 马继贤、宋治民自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我校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工作。

11 月 56 级考古专门化学生由冯汉骥、张勋燎、马继贤指导，与四川省博物馆联合，开始对巫山大溪遗址的发掘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编写简报。研究生林向参加了整理工作，并负责撰写发掘报告。发掘报告如期完成，但后来报告定稿散失，未能刊行。

1961 年

春 张勋燎为历史专业 58 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6 月,结合教学,与马继贤等率该年级学生赴广汉中兴(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其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刊于《文物》1961 年 11 期。

7 月 第一届(56 级)考古专门化学生 13 人毕业。

10 月 杨建芳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我系考古教研组工作。

本年 冯汉骥应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邀请赴西安,作了题为“西南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演讲。张勋燎随行作助手。

研究生林向赴陕西邠县,参加由陕西省考古所主持的下孟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

招收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 1 名,指导教师冯汉骥。

1962 年

研究生林向毕业后留系工作。

童恩正由峨眉电影制片厂调至历史系工作,担任冯汉骥的助手。

9 月 根据国家培养考古、博物馆专业人材的需要,经过充分的筹划准备,历史系再次从 59 级三年级本科生中分出学生 15 人,设立第二届考古专门化,独立进行考古学课程教学。

为系统而规范地进行考古学专业教学,考古教研组设立了相应的课程教学小组,主要有石器时代考古(杨建芳、林向),青铜时代考古(马继贤、童恩正),铁器时代考古(张勋燎、宋治民),考古学史(冯汉骥、张勋燎),考古学通论(杨建芳、马继贤、宋治民、林向等)。杨建芳、马继贤、宋治民分别先后为 59 级考古专门化学生讲授了《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铁器时代考古》,并为 59 级历史专业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

秋 冯汉骥率考古教研组教师先后两次赴资阳县对黄鳝溪大桥附近的“资阳人”出土地点和崖墓进行考古调查。

本年 冯汉骥完成考古专刊《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